

甲午再乱： 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

黄博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4)

摘要:皇祐四年末到至和二年初,“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传闻在四川地区流行,最初朝廷担心有新的内乱发生,于是精择大臣,预为之防,仁宗委派程戡主政成都,并颁布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但朝廷和民间都弥漫着恐慌的气氛。甲午年下半年,侬智高欲寇蜀的传闻与甲午岁凶之说结合,引起成都官民的集体性大恐慌,地方当局最初处置失当,形势一度恶化,但最后在张方平“以静镇之”的一系列措施下得以平息。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力量参与其中,呈现出地方政治运作的多种样态。

关键词:北宋中期;蜀地流言;“甲午再乱”;朝野应对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1-0169-06

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六日,宋仁宗与宰相庞籍经过议论后做出了一个任命程戡担任益州知州的决定^{[1]4182}。多种文献在描述时表现出君臣之间的忧虑,后来接替程戡出知益州的张方平在程氏故后所撰的神道碑中写道:

他日帝从容谕时相曰:“昔孟知祥以后唐甲午岁得蜀,至本朝咸平中,岁在甲午,盗发益州,西土大扰,故蜀父老识之。来岁复在甲午,蜀人以为恐,其精择可镇静者。”即而曰:“无易程某矣。”召对便殿,亲谕此指。且曰:“为朕再行,即召公为执政。”公顿首曰:“事君者有命无避,安敢以宠利居成功?”帝属意良厚,优除端明殿学士、知益州。^{[2]604}

从这段君臣对话中可以看到,这次益州知州的任命颇为特别,仁宗在听到了甲午年蜀地将有变乱的传闻后,对当地的局势发展深为忧心,在选定了程戡后怕他因蜀地已是传说的险地而不愿前往,特意说出了

“为朕再行,即召公为执政”的话。《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载了仁宗对宰相庞籍说的“戡还当置之二府,可预告之”的话,只是庞籍深感此举不妥而未予转达^{[1]4182}。与其说仁宗此时是在运筹帷幄,还不如说是有些举止失当,其表现并不“从容”。史籍上散见的这一关于蜀地在甲午年将有乱事发生的传闻,背景可能并不简单,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揭开正常状态下不易看到的民间舆论与朝野互动的详情。皇祐年间蜀地变乱的传闻可以说也是一种民间舆论,故本文试图以此为“话头”,重构皇祐年间蜀地甲午再乱^①传闻及其演进的全过程,借以探讨北宋中期朝廷与民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背后的各种力量在地方政治运作中的情况^②。

一 传闻其事:岁在甲午,蜀且有变

皇祐年间所谓的甲午再乱传闻,其核心内容是散布甲午年蜀地将会再次出现动乱的预言,其具体内容,《宋史·程戡传》曰:

收稿日期:2012-06-28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大学 985 工程“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平台基地”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博(1982—),男,重庆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史(宋史与藏族史)。

人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李顺之起而为盗，皆此时也。^{[3]9756}

类似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归结起来，流言的内容指向的是动乱即将发生的预期，而这种预测又不是毫无根据的；朝野上下之所以对此感到不安，即在于流言的依据与某些“逻辑”若合符节。这个预测并非像一般传闻那样无中生有，相反，它却基于一些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预测本身所依据的乃是过往历史为基础的鉴往知来。

孟知祥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开国之君，本为后唐西川节度使，在明宗时通过武力及其它手段逐渐控制了整个东、西两川，长兴四年(933)二月被授予东、西川节度使，封蜀王，十二月明宗驾崩、闵帝即位；第二年，即闵帝应顺元年(934)正月，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建国，是为后蜀，此年正好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4]126-136}。这就是所谓的“孟知祥之割据”，可谓甲午首乱。接着是淳化四年(993)二月，王小波率众起兵，攻掠州县，引发宋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民变，也即通常所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十二月，王小波伤重死，由李顺代领其众，淳化五年(994)正月攻入成都，此年正好也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5]11-18}。这就是所谓的“李顺之起而为盗”，可谓甲午二乱。至于张方平在《程戡神道碑》中引述仁宗所说“咸平中，岁在甲午，盗发益州”的话，则指的是咸平三年(1000)的王均兵变，不过却是误记，事实上该年的干支为庚子而非甲午。

甲午只是标记时间的符号，但在每次重复这个记号时都有变乱发生的这一历史巧合被人发现后，这个时间记号对于四川的意义便从偶然变成必然了。按照这一逻辑，所谓的甲午再乱，就当发生在淳化甲午年的六十年后，这一传言在蜀地民间肯定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散布，到了传到朝堂引起仁宗君臣注意的时候，已是皇祐四年(1052)底，离所谓新的甲午年(1054)到来还有一年多点的时间。此前流言早已在民间弥漫，“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出自“人言”，既唧唧上口，又触目惊心，而且当时还按照上述逻辑编有口诀。程戡到益州后就发现当地民间盛传《六十甲子歌》之类的与甲午蜀地再乱相关的歌谣^{[1]4384}。在这样的情况下，蜀地的普通民众成为传播流言的主体。当时成都隐士张俞就描述说，面对流言，“无知民传闻其事，鼓为讹语，喧讪震惊，万口一舌”^{[6]459}。尽管有些恐惧和焦虑，但从民众“传闻其事，鼓为讹语”的表现来看，老百姓对宣传流言有相当的热情。在流言四起

之时，人心惶惶在所难免。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前期流言在蜀地经常出现，太宗末年张咏治蜀时就因白头翁午后吃小孩的流言而造成“一郡嚣然，至暮，路无行人”的恐慌^{[3]9801}。有时面对流言，蜀地官府也自乱阵脚，跟着民众作鸟兽散。司马池为郫县尉时，“蜀人妄言戍兵叛，蛮将入寇，富人争瘞金银逃山谷间。令闾丘梦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称疾不出”^{[3]9903}，可见流言在蜀地的威力。

诡异的是，尽管蜀地流言频生，仁宗时期社会局势却一向安定，似乎颇为可怪。自王均乱后，蜀地再无动乱出现。到仁宗初年，四川社会朝野上下已开始营造“太平气象”。天圣三年(1025)，汉州德阳县发现一块写有“天下太平”的木头，朝廷特意下诏将该地改名太平乡^{[1]2379}。天圣六年(1028)，益州又献异花，取名为“太平瑞圣花”^{[1]2485}。不过，由于宋初蜀中变乱频生的不良记录，朝廷对蜀地的疑心并未消除。这一时期，朝廷对蜀地采取高压管治政策，一方面用严刑峻法镇慑蜀民，“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7]699}；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民间活动，甚至不惜制造冤案，滥杀无辜，天圣八年(1030)程琳知益州时，“蜀民岁为社祠灌口神，有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置官属吏卒，聚徒百余，琳捕其首斩之，而配其社人于内地，道路或以为冤”^{[1]2547}。成都地方官将祭神表演当作谋反予以镇压，可见朝廷对蜀人的疑心之重。朝廷派来的官员大多有此疑忌心理。宝元二年(1039)，“益州言火焚民庐舍三千余区。时火起南市，知州张逸心疑有变，与转运使明镐夜领往，而实不救火，故所焚甚众”^{[1]2913}。由此可见，蜀地的安定，是在严峻刑法加上严密监控下实现的，蜀人的不满自然也与日俱增，对此连蜀地士大夫也颇有微词，成都人何郟就曾赋诗就朝廷对蜀地特殊化政策表示不满^{[8]3454}。流言四起，便是蜀地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既然不能造反，也就只好造谣了。在这种氛围下，时人大多认为蜀人“奸讹易动”^{[6]565}——“俗悍巧劲，机发文诋，窥变怙动，湍涌焱驰”^{[6]452}。这样的地方特殊性又自然强化了外界对四川的“不安”，面对流言，中央和地方、朝廷与民间都心存忧虑，不得不谨慎对待。

二 预为之防：甲午前夕朝廷的举措与民间反应
“甲午再乱”之说，随着蜀地民众的传闻其事而上达天听，朝廷也开始忧心忡忡。既然蜀地的相对安定，是在严峻刑法加上严密监控下实现的，蜀地太平

表象背后的社会紧张,朝廷也心照不宣,时刻保持警惕。庆历末年,两川多年丰收,社会安定,朝廷反而担心官吏在繁荣的表象面前有所懈怠,竟然害怕借机有“奸民起而为盗”^{[1]3964}。此外,每当听到不利于蜀地安定的言论,朝廷都会特别留心。针对蜀地流言频发的风气,早在真宗时就制定了严厉的规定,对于造谣者,地方官可以先斩后奏,“诏西川诸州长吏,严察细民,敢有讹言动众、情理切害者,斩讫以闻”^{[1]1089}。天圣末年,韩亿知益州,“时知星者言,益部当灾,非仍饥,且有兵变。上心忧之,推选才堪镇抚者,而以公行且谕之意”^{[2]677}。结合皇祐四年末“甲午再乱”时的仁宗与程戡的君臣对话,仁宗对蜀地再乱的疑心,其表现可谓前后一致。不过,这次更为重视,除了精择大臣镇抚益州之外,随后还出台了一系列的防患措施。

皇祐五年(1053)正月,即委任程戡知益州后不到一个月,朝廷下诏整顿蜀地吏治,对“贪滥苛刻、庸懦疾病、害民妨务者”加以处理^{[1]4191}。四月,又因益、梓、利三路蚕事薄收,下诏免去先增上供绢三年^{[1]4205}。八月,考虑到甲午再乱的可能,命盐铁判官燕度亲赴蜀中考察盐井利害,“时言者谓前后甲午蜀再乱,忧明年复有变,故遣度往治盐菜,因预为之防”^{[1]4228}。九月,又“诏臣僚毋得以子孙恩请弟姪任四川职田处官”^{[1]4232}。这一系列的举措一个接一个,表明流言引起的紧张持续了大半年,不过从诏令内容来看,都是些临时性的惠民政策,旨在安抚蜀地民众,看来朝廷对甲午再乱的忧虑主要集中在下层民怨而引发的“内乱”上。程戡入蜀后,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措置的。

程戡刚刚到任时,流言试图煽动蜀地的驻军,“至彭州,民妄言有兵变,捕斩之”。程戡的果断处理,安定了军心。同时面对可能出现的内乱,程戡在蜀倡议并主持了大规模的筑城工程。入宋以来,“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3]9756},致使蜀中城防水平相当落后,程戡勇于任事,力主完缮城防,“城以保民者也,故萃以除戎器,戒不虞,聚而莫保,民何依焉”,遂“议版筑,浚池隍”^{[2]604}。八月,朝廷从“甲午再乱”的角度,同意了在四川修筑城池的建议,“诏益、梓路转运司渐修筑诸州军城池,毋至动民。言者谓蜀之城池,久废不治,甲午再乱,不可不豫为备也”^{[1]4230}。程戡首先完善了益州的城池。接着要求四川各州城修葺城池,如蜀州(治今崇州)自唐代立州三百多年,“无城,岁伐木刻而编为之塞”,在接到程戡的指示后,在皇祐六年(1054)正月,完成了筑城之役^{[9]第43册,357}。集中筑城,大

大加强了官府在四川的统治力量,为此仁宗特下诏奖谕程戡筑城之举“备虞暇豫”^{[9]第45册,321}。

由此可见,对于甲午再乱的流言,朝廷也是相当重视。尽管朝廷和民众都对此说又信又怕,不过面对甲午年必有蜀乱的说法,四川本地士人却心情复杂。事实上,由于朝廷长期疑心蜀人为乱,已在蜀地形成一套高压政策,而甲午再乱之说如果成真,无疑会使四川的特殊性更为严重,必然强化朝廷的这种疑忌心理和严厉政策,这是出身蜀中的士大夫所不愿看到的。当时苏洵就已经认识到外界对蜀人的观感与蜀地高压政策之间的关系,他曾反省说:“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10]354}张俞则极力否认历史上的蜀乱与甲午之间的神秘关系,认为:“甲午之乱非蜀之罪也,非岁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经制败坏之罪也。”特别是上一次甲午之乱(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因为“淳化之际,经制烬矣,赋税不均,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跟甲午之年没有关系。而目前的形势与淳化年间大不相同,“今观于时则大异,验于时则甚和,审于民则自安,度于兵则无状”,因此,“验之以人事明也,甲午之说诚诞矣”,且语带讥讽地说:“今则好怪者必曰岁当然,无乃溺于用术而昧于知几乎?”^{[6]459}张俞虽为隐士,却热衷政治^③,他的态度颇能代表蜀地部分士大夫的观点。蜀中知识精英在流言面前,既不像民众那样“传闻其事”,也不像朝廷那样“预为之防”,而是用理性的分析为本地政治争取较好的前景。在流言面前,各方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恰与各自的身份和地位息息相关。

三 以静镇之:甲午大恐慌的突发与平息

尽管皇祐五年的朝廷在紧张布置各种预防蜀乱的措施,不过事实上当年四川局势依然平稳,甚至因担心甲午再乱而被派去视察蜀中盐井的燕度,在入蜀后经过自己的观察,自信地向仁宗保证“今甲午必无事”^{[1]4228}。事实上,四川是在平静中迎来了传说中“蜀且有变”的甲午年(1054)。甲午年上半年,局势依然平静,如张俞所说“自春抵夏,未尝有毫发惊”,不过因甲午岁凶而形成的紧张和焦虑气氛仍未消除,“无知民传闻其事,鼓为讹语,喧讙震惊,万口一舌,咸曰岁次于某,则方隅有不幸”^{[6]459}。尽管气氛紧张,然而上半年四川却仍然维持着安定局面,朝野担心的“内乱”并未发生。七月,朝廷发布调程戡回朝为参知政事的命令,程戡因此得以入了二府,作了执政^{[1]4264}。仁宗兑现了当初给程戡的许愿,看来朝廷认为他的任务顺

利完成了。

然而,就在程戡离任前后,四川的局势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大约在七月间,边关传来依智高欲借大理兵寇蜀的消息,在突如其来的外患威胁面前,蜀人特别是成都民众情绪急剧失控。甲午再乱说与依智高入寇说结合起来,甲午再乱的阴影由先前对内乱的焦虑变成了对外患的恐惧,迅速形成类似“大众歇斯底里”的大恐慌^{[11]603}。依智高去向模糊,而且极具攻击性。如果传闻属实,危险就迫在眉睫,民众的恐惧就会失控。对此,张俞以亲历者述说道:

秋七月,蛮中酋长以智高事闻于黎,转而闻之益,云南疑若少动,岁凶之说又从而沸焉。缙绅从而信之焉,西南一隅,朝庭重忧之矣。^{[6]459}

其实,程戡入蜀前,依智高事件就已经开始了。皇祐四年(1052)四月,割据广源州的依智高起兵反宋,五月攻占邕州(治今南宁),并迅速攻下广西八州,东围广州,其后宋廷派狄青率军南下平乱,于皇祐五年(1053)正月击溃依智高主力,收复邕州,依智高率残部西逃^{[3]14217}。依智高西逃后,一度销声匿迹,直到一年多后宋廷才得到他进入大理的消息。至和元年(1054)六月,黎州(治今汉源)上报依智高“自广源州遁入云南”,此时朝廷已隐约感到威胁,于是开始在边境作一些预备工作^{[1]4263}。然后这一消息很快从边关传到内地,依智高欲入蜀似乎正好印证了甲午再乱的预言,蜀地特别是成都居民立即陷入焦虑与恐慌之中,苏洵说当时,“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10]354}。

而此时,程戡正好被召还朝升任参知政事,随后仁宗任命知开封府吕公弼出知益州,但吕氏固辞,仁宗只好收回成命,重新以知滑州张方平知益州。张氏起初也不愿意,在仁宗安慰下才同意赴任,但这样一来二去,就耽误了时间,张方平直到十一月才抵达益州^{[1]4267}。而正是这段时间,恐慌迅速达到高潮。由于益州知州不在,朝廷暂时下令益州路转运使高良夫“摄守事”,但高良夫面对流言表现得相当惊恐,且高调地仓促备战,“良夫闻之大惊,移兵屯边郡,益调额外弓手,发民筑城,日夜不得休息”^{[1]4306}。作为地方当局的代表,高良夫的举动不排除其借机引起朝廷重视,从而在中央争取更多资源的意图,然而这一处置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蜀人久不见兵革,惧甚,汹汹待乱”^{[12]397},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情绪完全失控,“民大惊扰,争迁居城中。男女婚会,不复以年,贱鬻谷帛市金银,埋之地中”^{[1]4306}。在恐慌期间,民间遭受重大损

失。此时,不但是一般民众,连蜀中精英(缙绅)也开始害怕起来。苏洵对当时的局势就颇为忧心,他上书益州通判,指出“蜀有三患,其二将形,其一既萌”,将形之二患即类似李顺一样的民变和类似王均一样的兵变都属内乱,而既萌的一患则是依智高残部欲寇蜀的传闻,对此苏洵担心外患将会成为内乱的契机,“三患幸而不发则已,不幸而有一起,二者必从而兴”,后果将不堪设想^{[6]439}。

看到蜀地完全陷入恐慌引起的混乱,朝廷对成都地方当局的措置失当并未予以纠正,反而“发陕西步骑戍蜀,兵仗络绎,相望于道”^{[1]4306}。为此朝廷还下诏奖励搬运兵器入蜀的陕西递铺卒,“诏陕西转运司:自永兴军至益州递铺卒,方冬苦寒,挽运军器不息,其各赐缗钱有差”^{[1]4292},致使事态继续恶化。十一月初,朝廷发现局势不妙,御史中丞孙抃上奏要求朝廷给新到成都上任的张方平打招呼,让他“先事经制,以安蜀人”^{[1]4290}。因此,张方平在入蜀途中就初步确定了平息流言的方针,经过思虑,他采用了与先前仓促备战完全相反的作法,即“以静镇之”。他对仁宗说:“南诏去蜀二千余里,道险不通,其间皆杂种,不相役属,安能举大兵以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当以静镇之。”^{[1]4306}镇静对待各类谣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是平息恐慌的良方之一,这类处理方式在宋代被普遍采用^[13]。

张方平的态度,与蜀中部分士人的观察颇为一致,很可能受到了他们影响。张俞在张方平赴任成都期间,曾致书讨论这一问题:

大理至南诏,南诏至益,其地相去数千里,山川险阻从而可知。然二虏虽大,皆顺服之国也,朝廷亦尝有恩以縻之,今乃舍部族之常居,附遁贼之余党,历险隘之远道,以谋入寇,彼虽蛮夷,亦知其迂而不为也。窃谓蛮狄之性,好诈而贪利,邛部诸蛮,平时以马贷我,朝廷务于怀远,所赏必倍,彼类亦谕其意,得非仗寇之衅,矜己之忠,而徼我以惠欤?^{[6]460}

张俞的态度很明确,不相信大理会帮助依智高寇蜀,并分析消息很可能是“邛部诸蛮”为了自抬身价、趁乱渔利而编造出来的。邛部诸蛮,以邛部川蛮为最大,是居于今西昌一带的乌蛮集团(今彝族的先民)的一支,由于宋朝采取疏远大理的政策,双方直接交流较少,邛部川蛮经常代表大理与宋朝交涉通好,是大理与宋朝双方沟通的主要中介^{[14]385-386}。因此,邛部川蛮在这一过程中上下其手、趁机谋利是很可能的,

张俞的说法不无道理。从张方平后来的行事看，张俞的这一分析是大体为张方平所接受的。

本着以静镇之的方针，张方平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首先停止各种高调地仓促备战准备活动，缓和民间的紧张情绪，入蜀途中，他“道遇戍卒兵仗，辄遣还”，到成都后，又“悉归屯边兵，散遣弓手，罢筑城之役”，接着公开辟谣，宣布依智高寇蜀不可信，“下令邛部川曰：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同时，张方平并非一味盲目自信，而是在辟谣的同时积极追查事情的原委，迅速切断消息的来源，“已而得邛部川译人始为此谋者斩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馀党于湖南，西南夷大震”^{[1]4306}。这一做法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对于平息恐慌、稳定局势起到显著的效果。关于揭穿邛部川译人散布的谣言以及弄清依智高到大理后的结局，苏辙有更详细的记述：

公徐闻智高入蜀之报，本雅州蕃牙郎号“任判官”者所为，遂呼至成都，诘其敢虚声动摇两蜀情状，将斩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举家数十口系雅州狱，身自入蕃穷问智高虚实，逾月不至，请举家为戮。公久之乃许。任如期至，得晓云南书，言智高至南诏复谋为乱，为南诏所杀。公乃释任而奏其事。^{[12]397}

通过精心的安排，张方平打探出依智高已死，其借兵寇蜀的传言当然不攻自破。不过，由于当时信息不畅，事实上宋朝长期以来都没搞清楚依智高的结局，《宋史》对此记载互异，一会儿说依智高“其存亡莫可知也”，一会又说知邕州萧注“募死士使人大理取智高，至则已为其国所杀，函首归献”，李焘在考辨时对此也发出“未知孰是”的感叹^{[1]4355}。但是，张方平所得到的消息，与《萧注传》颇符。1972年，大理出土的“白氏墓碑”也印证了上述说法，碑主白长善的祖先白和原是当年跟随依智高入大理的亲信之一，“乃大宋皇祐四年壬辰，……降于大理……不得不诛……函其首送于知邕州事萧□”，至于其随从，则“不可使玉石

俱焚”，他们在大理生活下来，白和原的医术高超，子孙后代一直在大理繁衍生息^{[15]47}。看来依智高确实已死。

掌握了依智高已死于大理这一重要信息，张方平以静镇之的处理方式就有了底气。于是，他在第二年新年期间安排了一场充满自信的表演，至和二年（1055）正月，“会上元观灯，城门皆通宵不闭，蜀人遂安”^{[1]4306}。上元观灯释放出来的充分自信，最终稳定了成都民众的紧张情绪。随后由甲午再乱之说与依智高寇蜀之说引起的恐慌就迅速平息了。由于本次甲午年未曾出现真正的内乱和外患，蜀地甲午岁凶的观念便渐渐淡出世人的记忆，到了下一个甲午年（1114），其时虽然已是北宋的末世，却再无甲午再乱之类的传闻在蜀中流行了。

从皇祐四年底到至和元年初两年多的时间内，“甲午再乱”之说从“传闻其事”到“喧讙震惊”，蜀地特别是成都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上至皇帝下至民众都被卷入到这一地方政治事件中。朝廷在甲午前夕精择大臣，预为之防；本地士人心态复杂，积极献策。虽然预期中的内乱并未发生，但外患却不期而遇，危机迅速出现后，局势一度失控。最后恐慌得以平息，朝廷大员张方平与本地士人张俞的计策结合起了重要作用。流言之中，各种力量交织，朝廷、本地士人、民众甚至缘边蛮部在这一过程中都试图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并随着事态的演进一一展开活动。流言的兴起和变化，调动了各方力量，使朝廷调整了部分酷政，改善了蜀地的政治环境，朝廷通过事件的圆满解决，终于消除了长期以来甲午蜀地再乱的心理大患，而地方士人借此机会得以表达意见，对地方政治发挥影响。然而，单个的民众却是此次事件中的受害者，他们在流言高潮面前惊慌失措，损失惨重，尽管流言来自民间以宣泄不满，但民众始终还是各种政治博弈中的弱者。

注释：

- ①“甲午再乱”为当时习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5皇祐五年八月戊午条载：“言者谓蜀之城池，久废不治，甲午再乱，不可不豫为备也。”流言，在古代主要是指言论的公开散布及传播的过程。孔颖达解释说：“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闻之，若水流然。”见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的《尚书正义》卷十二《金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00页。
- ②关于甲午再乱，目前尚无专题的研究。据笔者所知，吴天墀先生曾在讨论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民间心理影响时点到这一事件，此外黄焕光有一篇讨论依智高复出四川的问题的文章，其中也谈到甲午岁凶的事情，不过都未就这一问题展开具体的论述。参见：吴天墀《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宋史学会1984年年会论文，收入《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9页；黄焕光《关于依智高复出四川问题考辨》，《学术论坛》1985年第7期。

③张俞为当时有名的隐逸诗人,同时又有热烈的政治抱负,积极参与地方政治议论。参见:祝尚书《北宋西蜀隐逸诗人张俞考论》,《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官性根《论张俞的治国思想》,《求索》200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宋)张平.张方平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 [3](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4]杨伟立.前蜀后蜀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 [5]胡昭曦.王小波李顺起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6](宋)袁说友,等.成都文类[M].赵晓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1.
- [7](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5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9]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10](宋)苏洵.嘉祐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1]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12](宋)苏辙.龙川别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3]方燕.宋代讹言的传播与控制[J].甘肃社会科学,2011,(1).
- [14]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15]段金录.大理历代名碑[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Turmoil of Jiawu: The Gossips in Sichuan District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Government's Reply

HUANG Bo

(Tibet Research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year 1052 to 1055, the gossip that when Jiawu year comes, there would be a turmoil in Sichuan District was quite popular in Sichuan. At first, the government chose some capable official such as Chen Kan to Chengdu to prevent the civil disorder. Nevertheless, panic still covered the whole government. Later in the same year, it was rumored that Nong Zhigao would attack Sichuan which caused even greater panic than ever before among the officials and folks of Sichuan. The mismanagemen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made the situation even worse. Finally, Zhang Fangping adopted the measure of coping with shifting events by sticking to a unvarying principle and the tumult then subsided. During this process, various powers were involved and the local governing varied in form.

Key words: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gossip in Sichuan district; turmoil in Jiawu year; the government's reply

[责任编辑:凌兴珍]